

评 论

揭 侠 林少华 刘立善译

短歌杂感

尾山君要我写点什么，可我不太了解歌坛。究竟懂还是不懂短歌，自己也颇感疑惑。敬请读者把我写下的话语视作杂乱无章的感想算了。

短歌杂志上，近来出现了一种叫做生活派的短歌。可能是十分失礼的挑剔，我着实搞不懂，钟情于这一派短歌的各位先生是怎么想的。诗歌那么“平庸”，如果嫌这样讲不好听，就说成那么“现实生活化”或那么“民众化”好了。总之与其吟咏那么平庸的心境，倒不如别去挖空心思玩这三十一个字的戏，倒不如直接选择诗歌或者小说更便于叙述的形式为好。这种短歌，再怎么夸奖也断难达到让人折服的地步。更何况社会主义的三行吹嘘，真的是不良习气。

抛却巧拙问题不讲，我认为和歌与俳句应该去捕捉那些难以言表的心理活动。捕捉到的东西正因为是鲜活的，才越发让人感觉可贵。和歌假如都像生活派的作品那样在散文式的境界中徘徊，是没有任何出路可言的。

我对一茶的大部分诗句不满意的原因正在于此，虽然它不是什么生活派的和歌。诚然，一茶的诗句不坏，可谓人的情

感横溢，然而却少了元禄大家所拥有的苍古沉痛之趣。下一个冷酷的评语，甚至可以说他的诗句能让某个剃头铺的掌柜感动。而且恰恰是这一点帮助提高了一茶的名声，也不是没有可能。

以下是我的观察，不足为凭。自斋藤茂吉以后，或者自《紫杉》派出现以后，现代和歌基本上像是面目一新。其关系，和文坛因武者小路氏或白桦派而盛的道理大致相同。除去个别持有偏见的人，文坛上谁都承认武者小路氏或白桦派的功绩。但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歌坛的先生们在承认斋藤氏或《紫杉》派功绩方面太缺乏虚心坦怀的胸襟。不客气地说，斋藤氏或《紫杉》派带给歌坛的影响，比起武者小路氏或白桦派带给文坛的影响来，恐怕还要更大一些。既然承认他人的功绩与本人的尊严并无关系，那么大度一些又有何妨呢？（申明一下：本人既与白桦派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紫杉》派的任何恩惠。）

过去，马拉美曾被 *Poète des poètes* 《诗人中的诗人》推举过。当时的举荐人中好像还有科佩。遗憾的是，如此坦诚的胸怀不敢讲只是歌坛没有，怕是日本的整个创作界有没有都让人怀疑。

有一天看杂志，发现了一篇说斋藤氏和歌坏话的文章。坏话里，作为样品引了一首和歌：

冬阳柔和轻撒下，竹林寒霜变水滴。

那坏话妥当与否且不论，当我读到说这首和歌连一个土块的价值也没有时，不得不为鉴赏评价上竟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而震惊。既然在和歌的评价上相去甚远，我不由得想到：那么对小说的评价也当然是没准儿的了。这种坏话至少可以使人联想起“难度无缘众生”的真理，所以还是有点益处的。只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有些可怜说坏话的人本身。

我没有读过很多和歌。在伟大的歌人中间，自己好像与赤人和家持的缘分很浅。贯之不用讲，就连对西行法师也莫名其妙的没有什么劲。这一点，我曾被喜欢山家集的谷崎润一郎氏大骂过一通。之后虽然时而翻看一下，但还是没能达到五体投地的地步。西行是芭蕉的老师，但我感觉就像魏尔兰佩服丁尼生一样，徒弟方面更加了不起。所以当看到有的先生钦佩芭蕉同样钦佩西行时，就很容易产生非常失敬的想法：“这人钦佩芭蕉究竟是不是真的？”当然，这很有可能是外行人喜欢排个顺序的心理在起作用。

有人把和歌没有成为文坛的中心势力看成了歌人之罪。但依我看，其实全怪文坛上像我这样理解和歌的人太多的缘故。倘若不信，请让作家、批评家写篇和歌方面的文章一试便知。说不定这篇杂感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好例。不懂和歌的一帮人集中在一起，胡乱大喊大叫，“拿出感人的东西来！”就和瞎子去了展览会，要求退还入场费的道理一样。这样下去，即使大歌人层出不穷，和歌肯定也永远难以走到文坛的中央。

废话写了一大堆。其中虽然有很多错误，但我自认为并没

有说一句假话。请和歌的专家看在这一点上，多多包涵无用之处。

大正七年（1918）一月

摈弃不良倾向

—

里见弴君有一天在这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摈弃不良倾向”。旨在指出评论家轻蔑作家的才能与手段是错误的。对此，我深有同感。

才能暂且不论。就说手段吧，原本就不应有什么“过于高明”的评价。

人常说，艺术就是表现。凡是没有表现的东西，不管作者有怎样的思想，以及酝酿了怎样的情绪，这在作品的评价上与空空如也并无二致。作家的所见所感只有全部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批评的对象。假如按照现今通行于世的做法，给这个表现手段取名为“腕”，那么说它“过于高明”不就过分奇怪了吗？

我再重复一遍，艺术就是表现。而且所要表现的当然只是作家自己。那么无论手段怎么高明，技巧怎么巧妙，也丝毫没有办法摆脱作家自身的所见所感。当然，社会上往往把作品创作的程序做以下考虑：即首先有一个内容，然后再通过某种技巧表现出这个内容来。可是，这只不过是懂创作内情，或者虽懂创作内情但对其间有欠省察之人的想法。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单纯的一个“红”与“像柿子一样红”，并不是雕虫小

技的添加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有某种感觉上的差异。不是有没有技巧，而是内容有着差异。不，应该是技巧与内容合一的表现本身的问题。所以，表现手段的问题只应以“巧”或“拙”来区分，并不是谁想过分就能够过分得了的事情。

那么，所谓的“过于高明”是什么意思呢？我自身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说不准。但我以为，所指多半是“有某种超越技巧的东西”这种意义相反的一面。如果是的，那么此时明显就是“拙”，而绝不是“过于高明”。或者用更妥当的话来说，这个作品已经在内容与技巧不即不离的表现层面上失败了。同样，所谓“有某种超越技巧的东西”的批评，严格说来也不过是个简单的比喻。事实上说的是“有某种超越技巧的东西”一样的技巧。如此，自然是“巧”了。

除此以外，如果还有什么“过于高明”的意思，那就只能解释成这类评论家讨厌这种手段。这当然是个好恶的问题，无论好与恶都是评论家的自由。只是，此时尽量避免使用“过于高明”等类容易使人误解的字眼儿，倒可以维护文艺评论家的声誉。

二

现在回到才能的问题上来。与表示手段的“腕”不同，麻烦的是“才”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某种褒贬的意思在内。才是才子之才，才人之才，好像和轻佻浅薄是同义词一样地使用着。既然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那么才这东西，不用讲就知道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有才气的作品，毫无疑问应当唾弃。我由衷地认为，如此蔑视“才”的评论家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其实这种意见不讲也知道，所以其本身也难逃无用之讥）。

只是，若据此理由硬给小山内薰君、谷崎润一郎君、里见弴君、佐藤春夫君、久米正雄君的作品打上落选的红色标签，那就俗不可耐了。诚然，在他们的作品里有某种意味上的才气是事实。可是此时的“才”，究竟是不是属于才子之才、才人之才、轻佻浅薄之才呢？——这种来弄清所含语义，就一味抬高自己的做法，与日本中世基督徒们堂而皇之挥舞“天主”这一“Deus”意译，仿佛自己就真的成了天主，于是佛祖菩萨、八百万神灵统统成了自己的属下一样，在拘泥于字面意思的角度上讲两者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上述作家的“才”是什么呢？这就像《帝国文学》上一期一个署名秋风岭的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个性与众不同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硬要从这不同的东西中寻出某种相同的特色来，那基本可以归纳如下：——他们把人生放在某种特殊的位置上进行观察。因此，其表现也伴随着某种特殊性。或者可以进而视为这种特殊性也已经折射到了文章之中。不知何时成为问题的“多角度表现”（新技巧以及新技巧派也同样），其实不就是赋予这种特殊表现的名称吗？因为新词语不是自己创造的，所以难以断言确实如此。——从眼下来说，对所谓的“才”只能做出这样的解释。

假如“才”是这样的，那么要消灭它就绝不像文艺评论家自己所想像的那样容易，那样省事。近来在一部分人中间，向现实主义看齐的呼声，如同驱赶“才”这个蝗虫的锣声一样响声大作。和过去的客观主义以及平面描写一样，这也不是消灭“才”的特别有效的武器。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现实主义与“才”存在着势不两立的关系。在明辨这个问题之前，按照顺序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向现实主义看齐的主张是何物，然后再稍微议论一下其正确性如何。

三

当然，有人呼吁向现实主义看齐，但如果不是要在当今的日本开设极端的左拉主义分店，那就绝不是单纯的写实主义。上个月的《新小说》上有一篇本间久米君的文艺时评，叫做《浪漫主义乎？现实主义乎？》（不巧，手头没有其它的趋向现实主义论，请予谅解。）文中说道：“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居伊约所说的彻底的深入挖掘真实存在的艺术，就是通过挖掘真实存在，奋勇抵达我们的目光所不熟悉地层的艺术，就是彻头彻尾现实的艺术，就是彻底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说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彻底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这种议论就好像是在说“了不起的 genius”是“伟大的天才”，让人觉得滑稽。不过，本间君所主张的意思并没有因此而特别难以理解。其他的问题不清楚，惟独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本间君也属于我们同道之士。他的意思好像是说，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直接贯彻真实存在——即首先能够满足我们真正要求的艺术。直到这一点，我们还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接下来聆听其向现实主义看齐的主张，却发现本间君不再提这个定义，一方面攻击浪漫主义，另一方面给予“作为现实主义中心流派的我国的自然主义”以热心的鞭策，号召它尽快向现实主义看齐。究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不是水火不能相容？虽然很值得怀疑，但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去管它。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本间君认为浪漫主义不行的理由——这理由与刚才颇为明快犀利的现实主义的定义相比，颇为晦涩难懂。基本上能够让人明白的理由有两点：一是称现在主张浪漫主义已经过时；一是说浪漫主义是“仅凭单纯的空想，唤起

趣味的艺术”，是“单纯的游戏文学”，是“单纯的趣味主义的文艺”。为方便起见，我们从第二个理由谈起。假如浪漫主义确如其高见是那么一种主义，那真的应该消灭。在这一点上，与现实主义的定义问题一样，本间君与我等为同道之士是毋庸置疑的。这样说，和上面称浪漫主义为“单纯的游戏文学”自然属于两个问题。那么，本间君痛骂浪漫主义的理由在哪里呢？让人遗憾的是，我翻遍了文艺时评也没有找到，而只有一处说“我排斥陈旧意义上的浪漫主义”，陈旧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似乎即意味着“单纯的游戏文学”。但是作为十九世纪一大精神运动的浪漫主义，仅以“单纯的游戏文学”一语是难以了事的（今天看来即使有很多地方值得谴责）。这自然说明关于确切的浪漫主义其“词语所包含的文艺史意义，时至今日没有必要再来重新诠释”。可是除此之外，本间君经常武断地使用“不用讲”啦、“无可争议”啦等等豪言壮语，却不肯把恰当的道理摆出来。对本间君而言就算是“不用讲”也明白的事，如果听者不明白，那么把意思交代清楚，是丝毫也不会损伤到作为评论家的本间君的威严的。然而事实上适当的理由不清不楚，所以话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既然如此，我们先对这种议论敬而远之，下面来倾听一下他的原始理由。他说：“关于近代文艺史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词语所包含的文艺史意义，时至今日没有必要再来重新诠释，最近代的文艺基调不是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果强求把以前的文学史家们赋予特色的浪漫主义无条件地照搬到今天来，那就是明显的时代错误。”如此单看引文，煞是威风，确有大手笔之风。当然，要成为大手笔，还必须满足那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本间君应该证明在今天的文坛，他看到了“强求将以前文学史家们赋予特色的浪漫主

义无条件照搬到今天来”的倾向。或者证明今日文坛所有的浪漫主义精神，都与“以前文学史家们赋予特色的浪漫主义”完全一致。如果前者是事实，本人虽不才，也会批判其时代错误而不肯甘居他人之后。在下虽能力有限，却愿附骥尾，为攻击浪漫主义添柴加火，并希望以攻击施莱格尔兄弟的亨利希自居。所以本间君在这一点上，也无疑属于我们的同道之士。只是遍观世界，无论日本还是西方，都没有发现“强求把以前的文学史家们赋予特色的浪漫主义无条件地照搬到今天来”的情况，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假如这是自己的孤陋寡闻所致，当然要另外求教于本间君。只是关于这一点，事实上至今没有得到本间君的任何垂教。这样一来，论点便不得不转为后者。而这一点的理由也是颇为大胆的。因为，假如他要证明这个理由的正确性，那他就不能承认各个时期的浪漫主义有什么差异，势必按照文艺史上主义的新陈代谢顺序，将其统统称之为时代错误。确实，本间君自身也流露出了这种口吻。仅仅凭借浪漫主义之后出现了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文艺史上过去的事实，就说主张浪漫主义是时代错误；那么自然，单纯凭借现实主义之后出现了象征主义以及“新”浪漫主义这样一个文艺史上的过去事实，本间君自己倡导的现实主义也难免是一个时代错误。如果不损伤本间君谦逊的美德，这里将君与歌德相比。晚年的歌德信奉古典主义，仅仅凭借古典主义之后出现了浪漫主义这样一个文艺史上过去的事实，亦可将之称为时代错误。不是吗？不用说，这是一个滑稽的两难推理。

如同以上所辩，本间君根本没有掌握什么理应非难浪漫主义的有力根据。只是从头至尾，辛辛苦苦罗列了一堆连投稿人都知道的浪漫主义坏话，并因此而称：在这个范围内如果不是“现实主义中心流派的我国的自然主义”，则难以解救目前文

坛的颓势。这，也不能不叫人感到万分的奇怪。（自然派，特别是日本的自然派，究竟是不是居伊约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中心流派呢？问题太复杂，故不在此议论。）如此看来，本间君在攻击浪漫主义方面是失败了，继而把现实主义的继承权交给自然派也失败了。所以，在当初的立论目的之中惟一成功的是他给现实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当然要给某个主义下个定义绝非易事。所以，本间君文艺时评的功绩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评价。但是，从本间君自己吹嘘说是“法国的一个叫居伊约的人说了同样的话”来看，如今他也是难以承受独创荣誉的。

那么，本间君的文艺时评是彻头彻尾的胡扯吗？那倒不尽然。诚然，逻辑是混乱的，论点也不能服人。但是，凡多少同情该君的人都应该不难看出，在其混沌的原料主义的行列之中，本间君也朦胧并直觉地感受到了某些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实主义这东西与自然派及浪漫派不属于同一类，其位置在与之相反的方向。自己方才急于揭本间君之短，以下则稍举君之所长。既然君之文艺时评含有真理，那么理应阐明其不可小视的原因所在。

君说，“真正深刻触及现实的幻影，真正透穿现实之底的梦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幻影，已经不再是梦境。这实际上是一般所说的超出现实的现实。”如君所言，是否始终真实并不受所描写的事件和场景支配。高师直窥测澡堂也罢，李太白成鱼变仙也罢，就是说即便使用通常所说的浪漫主义素材，如果表达出来并无缺憾，那么就是捕捉到了“一般所说的超出现实的现实”。因此，从本间君的立场上说，只是追求素材上描写现实且主张向现实主义看齐的言论，就成了不屑一顾的庸俗之见。于是君进一步列举了实际事例，讲道：“比之标榜现实主义的左拉所描写的人生图景，浪漫主义者巴尔扎克的梦境和

幻影，将给予我们远远更多现实的味道。”就是说现实主义云云，对于什么浪漫主义抑或自然主义，只是存在于“体味到现实”的表现之中。已经作古的浪漫主义者巴尔扎克就曾经持有现实主义思想。将来日本的浪漫主义各位作家，当然亦非没有成为此等意义上现实主义者的可能。有人称，今日文坛“探求现实不彻底，观照现实平淡单调且呈庸俗化”，而这“不是靠浪漫主义便可打破、可转向的”。这种说法已经成为明显的谬误。莫泊桑“以不同于居伊约的话语阐明了现实主义的真髓”。他说，“提供比事实本身更完整、更显著、更可靠的事实的幻影”，这正是作家应该努力的方向所在。越是他所说的幻影主义者，就越能深刻地洞穿现实，越能透穿现实的存在。这时，所有不同主义的作品都将等同于现实主义的作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浪漫主义不仅其倡导本身”不再是“一个时代错误”，“而且这在事实上……产生回避现实的不良倾向的可能性”也是没有的。所以，在下评论本间君的文艺时评之初，故意避而不谈的问题即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的问题。事实上本间君已在他的文章中妥善解决了前述问题。只是该君过于蔑视浪漫主义，或者过于支持自然主义，而忽视了这半直觉所感到的真理，并把逻辑之车推偏了方向。这才下了一个与自己导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古时，预言家巴兰试图诅咒以色列，反而祝福了它。如今，本间君本意为了消灭浪漫主义，反而鼓励了它。当然，我自己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看成本间君作为评论家的荣誉。虽然他自身没有意识到，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其文艺时评才勉强摆脱了无谓的饶舌。我希望至少在这一点上与本间君共同祝福。

四

以上，列举了现实主义并不依赖主义这样一个带有反论的事实。原本希望接下来重新回到“才”的问题，由此按照自己的观点谈论一下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回到“腕”的问题，而使自己的论述有个完结。可是在本间君的文艺时评上消磨了太多时间，以致现在早就到了规定的字数和交稿的期限。只得就此搁笔。通过前面的内容，想必基本可以想像得出：只要不对“才”字从坏的含义上作解，便与“向现实主义看齐”不发生矛盾（当然，假如不认可我关于“才”字的解释那只好自便。届时再聆听高论好了）。

里见君曾指出轻视才能和手段是错误的。总之，我在这里的所言所辩是步其后尘，谈了与他相同的主张。不过，即使论者的观点相同，在道理以及细微之处我与里见君无疑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担心由此而累及里见君，顺便恳求他予以理解。

大正七年（1918）十月十六日

大正八年（1919）六月的文坛

在写月评之前，想预先做个交代。

本人的月评是小说月评，不是戏曲、诗歌以及评论的月评。而且，之所以不涉及其他文艺领域，自然并不是因为我特别看重小说，而只是报纸的版面不够、自己时间不够的结果所导致。所以，有关专家哪怕有惊天动地的大文字发表，自己作为月评家却缺乏关注，希望能够原谅。

此外，小说月评也不是对当月发表的所有小说的评论，而只是对偶然间进入自己视线的小说的评论。因此福兮祸兮，不能说在那些没有进入自己月评的小说中，就断然没有笔落风雨惊的杰作。倘若杰作的作家及读者不责怪自己的怠慢，幸甚。

最后，对那些偶然间进入自己视线的小说的评论，其实也只是自己关于其作品的极其杂乱无章的感想。所以，自己绝没有利用这个月评来制造天下公论或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即或有，也还没有做好把那些东西套进去的逻辑模子，而无法灌输到读者的头脑中去。既然如此，如果还有这样的期待无疑是头脑发呆。因此，只要我自认为是感想，就请读者也以一种“不就是读了小说之后的印象吗”之类的轻松心情去读。否则，那些小说作家自不待言，我自己也会深感麻烦。

罗列了这么多任意的要求，但我个人要把这个月评推出的所具资格，说到底有九成要看读者对我个人是否感兴趣来决

定。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自身委实平庸而不足以唤起大方兴趣感到羞愧。同时还要附加一句，那就是对于被我拽进连自己也心中没底的月评中的文坛诸君，在下深表歉意。

下面，言归正传。我最初读的是相马泰三氏的《昨夜子》（《新潮》）。在这个小说里，我遇到一位在兄嫂家寄宿待嫁的、与作品同名的女主人公。但遗憾的是，昨夜子这个人物塑造得过于单薄，简直难以成为作品之名。我以为原因可能在于，落脚于哥哥家之后的描写没有落脚前的描写那么得要领。前面那一节，挺有意思。矿山的一个年轻事务员逮苍蝇喂杜父鱼，所以读到末尾时，就琢磨着昨夜子如果也像杜父鱼一样活跃就好了。

接下来，读的是吉田 紘二郎的《马铃薯田》（《新潮》）。在这里遭遇到的是一个感情强烈的九州女，她害怕情人去战场而试图弄瞎其双目。像我等这样好奇心特别强烈的人，最想了解的就是那等可怕的事件。可糟糕的是，作者只是彻头彻尾讲述了农民情人的故事，看来吉田氏对马铃薯比对女人更有兴趣。如果能这样忠实地把里里外外的心理都交代给读者，也会很有趣味。可惜作者不时地驻足不前，感叹什么“浅蓝色的天空”啦，赞美什么“红宝石一样的”石榴啦，这种半成品似的小说让人感觉太不够劲儿。

接下来读的是加藤武雄氏的《悲惨恋话》（《雄辩》）。加藤氏是位谦厚的长者，他在小说的后记里，把自己的作品与广津和郎氏《滚落的石头》相比，流露出了褒他贬己的谦逊。在我读来，该作品根本无须对《滚落的石头》俯首。S的恋爱心理的确有冗长之嫌，但写得合情合理。我甚至觉得有些地方比《滚落的石头》还要好。不过，这需要和广津氏商量商量才能肯定。顺便介绍一句小说中出现的有趣的话：“我像将棋